

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民生保障

□慎海雄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江苏调研时指出,要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民生保障,像落实发展指标一样落实民生任务,民生工作面广、量大、头绪多,一定要注重稳定性、连续性、累积性,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任接着一任做。

新常态下,稳增长和惠民生相互促进,民生新亮点温暖着亿万人的心。习总书记关于民生工作的最新论述,不仅深刻地将民生保障、民生任务与经济建设、发展指标放到同样的高度,而且鲜明、凝练地指出了抓民生保障、落实民生任务的方法和路径,强调了领导干部在民生工作上应该秉持的正确政绩观,具有深远的思想意义和现实的指导意义,集中体现和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党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

“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关于民生工作做出了一系列论述,形成了完整、系统的“民生观”——

改善民生是根本目的:“我们党和政府做一切工作出发点、落脚点都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改善民生是终极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这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

改善民生是群众路线最生动最现实的实践:“我们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

改善民生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

改善民生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改善民生没有终点站,只有不断的新起点,要让改善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无风险收益率下降将继续推高股市估值中枢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 尹中立

2014年前6个月上证综指一直在2000点至2100点之间窄幅波动,但从7月底开始逐渐形成上升趋势,7月底至11月中旬,上证综指累计上升500多点,11月底开始上涨加速,从11月24日至12月22日指数上涨600多点,日均交易量超过70000亿元。股市不断上涨,但关于股市上涨合理性的质疑也不断增加,一个广泛被提及的问题是: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股市为何上涨?

笔者认为,从股市定价的理论逻辑看,股价变动与盈利预期、无风险收益率和风险溢价这三个因素有关。当前的市场无风险收益率出现了趋势性变化导致股市牛市。

无风险收益率下行支持股市上涨

从经济运行基本面看,股市上涨似乎缺乏支撑。从GDP增速看,前三季度GDP增速只有7.4%,明显低于2013年7.7%的增速,也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并且经济增速下滑趋势还在延续。CPI一直在低位运行,PPI已经连续20多个月处在负增长区间,用电量增速只有3%左右,上市公司盈利增长明显放缓,这些数据说明经济状况的确已经进入“新常态”,因此“盈利预期”的因素并不支持股价上涨。

再从风险溢价看,同样不支持股市上涨。股市的风险溢价一般与货币政策的松紧度成反比,信贷与货币扩张,风险溢价降低,则股市上涨;反之,信贷与货币紧缩则风险溢价上升,股市下跌。2014年的货币政策延续2013年的货币政策基调,实行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信贷与货币并没有明显扩张,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一直在13%左右,三季度货币增速甚至还低于13%。可见,从风险溢价的角似乎也找不到股价启动的理由。

2009年之后,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出现明显抬升。2009年,在“4万亿”政策的刺激下,投资盛宴再次开启,其规模是空前的。而且这次投资扩张与以前有所不同。无论是1992年还是2003年的投资扩张,都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导,这次扩张是政府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双轮驱动,并且互相促进。双轮驱动的结果是投资扩张的惯性更大,政策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力也更强。2010年开始,中央开始有计划地采取“收”的措施,信贷重新恢复规模控制。和以往紧缩过程一样,银行体系之外的融资迅速兴起。

在银行信贷规模重新受到控制的情况下,政府的投资项目和企业的房地产投资都必须到银行体系之外寻找融资渠道,政府融资平台应运而生,信托等影子银行迅速膨胀。在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融资对利率是不敏感的,而房地产市场持续价格上涨使得开发商对利率也有较高承受力,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社会融资总规模空前膨胀,且市场融资利率居高不下。在刚性兑付的潜规则下,这意味着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或信托产品收益率可以近似视为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居高不下的无风险收益率使股市的估值受到抑制。

从2014年第二季度开始,市场无风险收益率出现下降趋势。要考察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的变化应该从融资的供给与需求两方面来分析。从资金供给方来看,只有存在“刚性兑付”的潜规则前提下,投资者才会选择信托等影子银行,一旦“刚性兑付”的潜规则不存在,选择影子银行的资金就会减少。从今年4月以来,信托产品的违约事件逐渐增多,房地产信托产品募集资金越来越困难,这是市场无风险收益率出现变化的信号之一。

从资金需求方来看,今年5月之后,房地产市场出现了转折信号,在没有政策打压的情况下房价出现了环比持续下跌走势,房地产投资节节走低,房地产融资的需求当然也会减少。房地产市场出现转折信号也影响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需求。因为大多数地方政府的融资是以土地作为抵押的,土地价格走低及交易量下降影响到抵押物价值。与此同时,《预算法》修订也对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产生了直接的抑制。可见,7月份的融资数据超预期减少并非偶然,很可能是融资需求出现转折性变化的标志。

尽管人民银行没有下调存贷款利率,但银行间市场利率明显下降,尤其是影子银行的融资利率及融资规模都有

习总书记的“民生观”,是新时期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深刻体现,指导我们夯实执政之基,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民者,万世之本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无一不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两千多年前的屈原尚能“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今天,我们共产党人更要视民苦为我苦,视民难为我难,视民艰为我艰,与人民同忧乐共患难。”“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于民之忧乐。”可以说,解决民生问题是最大的政治,改善民生是最大政绩。

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利益固化的藩篱正在冲破的关键时期,尤其需要固本强基、始终赢得人民群众的关心、理解和支持。英国有一句谚语:“人民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我们今天的一切发展,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如果我们的发展不能回应人民的期待,不能让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样的发展不仅失去意义,更难以持续。

正因为如此,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刻,保障和改善民生始终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抓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截至目前,习总书记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的7次会议,户籍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改革……民生焦点难点和热点,都是改革的着力点,顺应人民新期待的改革相继启幕。在即将过去的2014年,中央始终把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摆在突出位置,惠及民生的好政策密集出台。尽管经济调档减速,就业却再创新高,人民收入仍持续增长,民生物价保持基本稳定,各种社会保障日益健全,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民生新风景,见证着党和政府深厚的民生情怀。

习总书记此次关于民生工作的最新论述,阐明了“民生观”最关键的两个基本要点:一是抓民生工作在各项工作中的地位问题,就是“要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民生保障,像落

实发展指标一样落实民生任务”;二是以什么样的工作态度、政绩观抓民生工作的问题,就是“一定要注重稳定性、连续性、累积性,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任接着一任做”。深刻理解了习总书记“民生观”的这两个基本点,就等于得了要领、获了真谛,掌握了抓民生工作的法宝。

“一切工作出发点、落脚点都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习总书记将民生工作提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有着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我们强调在民生问题上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但是,的确有一些领导干部满足于做表面文章,浮光掠影、虚晃一枪,锦上添花的抢着干、雪中送炭的无人问,并不愿意沉下心来扎扎实实为民办事。甚至老百姓自己办不了、办不好的揪心小事也长期无人问津。比如,在一些城市年年发水年年淹的尴尬、“吃人”的窖井年复一年“吃人”的惨剧,都在提醒我们的各级干部必须要像抓经济建设、抓发展指标那样,在民生事业上聚焦聚神聚力、具体而非空泛地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民生工作千头万绪,很多方面并不显山露水、立竿见影,需要虚功实做,扎实苦干。能不能像抓经济一样抓民生,考验的是党员干部的群众观点和工作作风。

“功成不必在我”,要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这是习总书记历来倡导的政绩观。这次在论述抓民生工作时,习总书记再次语重心长地强调了这一重要思想。他指出一定要注重稳定性、连续性、累积性,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任接着一任做。沧海滔滔,民生不息。“民生工作面量大,许多民生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有的需要马上办,有的则需要打基础、谋长远。因而,民生工作要分清轻重缓急,改善民生要有底线思维,坚持‘用政府紧日子换百姓好日子’;还要学会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从实际出发,先从既利当下又利长远的事情做起,绝不能超越自身发展现实,搞‘高负债’式的民生改善。

但在现实生活中,有的领导干部唯恐在任内留不下什么

东西,不是自己开头的不为,一定要刻上自己的政绩印记才干”;有的领导干部好大喜功、贪吃卯粮,指望一任干完所有事;有的领导干部狮子大开口,把政府的钱袋子当作了不上锁的钱柜,搞不切实际的浮夸,把老百姓的胃口吊得很高——一些项目最后的结果往往是难以继,给一方经济发展带来持久难以卸载的沉重负担,甚至“为官一任,陷害数代”,为民变成了害民。这些不切实际的所谓民生工作,其实都是错误的政绩观、扭曲的价值观和浮躁的作风所导致的,我们要坚决予以禁绝,决不容许其滋长。为此,应通过引入以民生指标为主的地方干部考核体系,进而实质性地根治不良政绩观。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明年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时提出,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基本思路,多些雪中送炭,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众生活,更加重视社会大局稳定。这三个“更加”,突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个重点,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筑就坚实的幸福底线。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向改革要动力,向调结构要动力,向改善民生要动力。新常态下,我们要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结合点,将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的聚焦点放在惠民生上,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必须是更有人情味、更温暖、更包容的增长,围绕人们向往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舒适的住房、更可靠的社会保障,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保基本、补短板、兜底线,向民生改善要发展潜力。例如,基础设施与公共事业,不仅为当下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为长远的发展夯实根基;“托底”为居民消费打消后顾之忧,实现内需拉动才不是纸上谈兵。

“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发展经济、深化改革,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有梦想成真的机会,让人们生活有奔头、人生有盼头。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把握习总书记的“民生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各项惠民政策,直面新形势新阶段下的民生诉求,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让群众时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源源不断地汇聚起推进改革的强大动力。

新旧能源“冰火两重天”

□厦门大学能源经济中心主任 林伯强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能源发展的涵义和前景也出现分化,新旧能源将面临不同的政府政策和成本环境。

典型的“旧”能源是煤炭行业,发展进入“寒冬期”。从需求侧看,随着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煤炭需求疲软,而雾霾治理下的煤炭替代和控制也挤压了煤炭能源发展空间。2020年控制在42亿吨的目标,更是给煤炭行业的未来扩张设定了“天花板”。从供给侧看,在2012年前煤炭牛市的推动下,煤炭快速大幅投资。据估计,现有煤矿产能超过40亿吨,在建和技术改造煤矿规模超过10亿吨。一方面,随着在建和技术改造煤矿陆续投产,煤炭行业的供给能力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治理雾霾等原因,煤炭需求很难得到提升,甚至在消费峰值出现后绝对量还会开始下降。因此,供给过剩将会成为未来几年煤炭行业的常态。随着庞大的能源消耗带来的环境问题集中爆发,对煤炭进行替代、严格控制煤炭消费,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煤炭行业发展陷入困局,需要另寻出路。

通过限制产能以平衡供需和维持价格确实是短期唯一出路,但具体执行问题很大。首先,煤炭新建产能投资金额很大,大量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投资者面临很大的财务压力,因此有很强的释放产能冲动,容易陷入“低价量长”的循环;其次,煤炭市场供过于求,限产者面临很大的风险,因为其他煤炭企业既有动力也有能力增产走量;再次,我国煤炭行业集中度较低,各利益方的协调问题会使限产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因此,发展煤化工,特别是煤制油和煤制气,推动煤炭同时作为燃料和原料,可能会成为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煤炭行业自救手段,但需要特别谨慎对待。发展煤化工有很多理由,比如中国“富煤少油气”的资源禀赋条件,较低的煤炭成本和人力成本,相对短缺的油气供应等。从带动GDP、就业和税收等角度,煤炭资源丰富省份的政府也有很强的激励来刺激煤化工发展。但问题其实没那么简单,主要问题是煤化工面临的约束,取决于是否有利于环境治理。环境治理的政策风向变化,会使煤化工的市场空间和利润面临很大的风险。

因此,在雾霾治理的背景下,基本上可以预期,煤炭野蛮生长已经成为历史。未来煤炭行业发展的出路首先在于改善自身经营状况,剪除落后过剩产能,提高整体运营效率。煤炭行业寻求变革的另一个突破点在于煤炭清洁化利用,通过煤炭清洁化利用,减少煤炭利用过程中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缓解煤炭产业和环境治理之间的矛盾,减轻雾霾治理而导致的煤炭替代压力。

作为“新”能源的清洁能源发展似乎前景一片光明,但困难也很多。长期“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资源禀赋;二是煤炭的低价优势。因此,清洁能源发展需要面对替代能源的来源和高成本的问题。

政府承诺到2020年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比例为15%。完成这个比例实际上给煤炭的替代能源也做了限定,风电和太阳能显然需要进一步鼓励,特别是分布式发展。统计表明,中国在建核电机组28台,加上目前已投运机组,总计装机容量约4800万千瓦。考虑到核电建设工期至少需要5—6年,即使2015年前有新的机组开工,乐观估计到2020年核电投产装机5800万千瓦,占2020年一次能源也不过3%左右。水电也由于较长工期的限制,到2020年大致只能达到3.5亿千瓦左右。生物质和地热能等量级相对较小。要满足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15%的要求,风电和太阳能需要大规模发展,大致为风电2亿千瓦,太阳能1亿千瓦。因此,可以预见近期风电和太阳能还会得到政府从政策和规划上的大力支持。

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成本。虽然随着技术进步和规模扩大,风电和太阳能的成本不断下降,但要实现平价上网依然存在距离,特别是考虑到这些可再生能源的并网成本以及配套储能成本。如今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价格正在下降,清洁能源的成本劣势更加明显,实现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展,补贴需要更加有力。

分布式是可再生能源的重要发展模式。风电和太阳能等新能源基地基本上集中在西北、蒙东地区,大规模发展风电和太阳能需要建设电力外送通道。由于风电和光伏发电随机性和间歇性特点,大规模并网发展会对电网造成很大的冲击。分布式模式可以解决资源与负荷在地理上逆向分布的问题,而且对电网的冲击比较小。

战略上看问题,推动煤炭替代和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长短结合的政策组合。短期靠政策,通过更高的环境标准和约束指标,以及能源价格改革和补贴,迫使煤炭替代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中长期则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来解决成本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该为创新承担更多的责任,包括提供资金支持、保护创新权益,以及对新技术应用的推广等。

